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JINGJISHEHUIFAZHAN YANJIUCONGSHU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与外国政党体制

ZHONGGUO TESE ZHENGDANG ZHIDU
YU WAIGUO ZHENGDANG TIZHI

姚建华 等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与外国政党体制

姚建华 等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外国政党体制/姚建华等编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12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ISBN 7-213-02710-7

I . 中… II . 姚… III . ①政党—政治制度—研究
—中国②政党—政治制度—研究—外国 IV . ①D665
②D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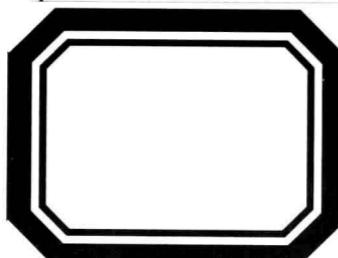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0576 号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外国政党体制

姚建华 等编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朱银才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校对 叶 宇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市环城北路 41 号)

毫米 1/32



月第 1 版
月第 1 次印刷
13-02710-7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1
一、中国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形成	1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确立和演进.....	14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新时期的发展.....	30
第二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点和内容	42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特点.....	43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主要内容.....	46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优势分析.....	56
第三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国情基础	66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探索和认识.....	66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形成的历史国情.....	69
三、正确把握当代中国国情，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87
第四章 人民政协在多党合作中的功能	106
一、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重要机构的历史地位	107
二、人民政协在多党合作中的重要功能	114
三、改进政协工作，发展多党合作事业.....	117
第五章 参政党的职能和自身建设	124
一、参政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主要职能	124
二、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134

三、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参政党的作用	153
第六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法律化	171
一、政党制度法律化是当代政党政治共同的发展	
趋势	171
二、中国政党制度法律化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172
三、切实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法律化	180
第七章 西方国家的政党体制	187
一、西方国家政党体制的缘起和发展	187
二、西方国家政党体制的类型及特点	206
三、当代西方国家政党体制的新变化及发展趋势	217
第八章 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政党体制	233
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体制崩析的原因	233
二、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现有的政党体制和政党格局	248
三、俄罗斯和东欧各国政党体制的走向	259
第九章 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	267
一、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产生和政党体制的形成	267
二、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区域性特点	282
三、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选择	308
附录:台湾的政党政治和政党体制	324
一、台湾国民党时期的一党政治	324
二、台湾多党政治的萌芽和形成	333
三、世纪之交台湾政权更迭及政党体制的特点	340
参考书目	351
后记	355

第一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本书中特指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政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才出现的产物。当今，政党政治已风靡于世，在全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十多个小国和地区没有政党。但是，政党政治的普遍性并没有排斥具体国家具体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并且，它还具有不可简单移植或模仿、复制的特性。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政党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归根到底，它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历史唯物主义还认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存在与发展，都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正是我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是新中国成立 50 多年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形成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的正确选择。然而，它并非历史“一锤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 页。

音”的最初“中标者”，而是历经对几种政党制度从性质到模式多次磨合后方才得出的科学结论。当然，它与其他政党制度也绝非毫无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汲取了它们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才有了现在的成功实践。所以，要真正认识和理解今天的政党制度，我们有必要首先来扼要追溯昨天的政党制度。

（一）中国政党的发轫。

中国在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没有产生政党，也不存在产生政党的社会条件。在中国文字中“党”这个字出现得很早，据中国古代典籍记载，“党”最初是指居民的基层单位。后又引申为亲朋好友以及在政治上有亲密关系的人群，如“朋党”、“会党”、“同党”、“党羽”等称谓的使用。显然，中国古代对“党”的这些理解同我们现在所讲的“政党”含义相去甚远。就世界范围而言，政党是近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在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早出现的是资产阶级政党，首先在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产生，如 17 世纪 70 年代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出现政党也是近代的事情。中国政党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受西方近代政治的影响，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以 1905 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为开端。

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起，中国人民就开始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求生存、求解放，力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外御侵略，内反封建，是中国人民肩负的双重任务。然而，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运动均未能完成挽救民族危亡、消灭封建统治的大业。于是，中国资产阶级革

命派义不容辞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代表。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团体“兴中会”，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推翻清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兴中会的成立及其活动，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的诞生，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在孙中山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国内外一些出身中下层的革命知识分子，也纷纷投身于救国图存的资产阶级革命行列。1904年，黄兴、宋教仁在长沙成立“华兴会”，蔡元培、陶成章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中华革命军、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代表在日本东京集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建立了领导机构，制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孙中山把它阐述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列宁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①。

中国同盟会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成立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已经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它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它的最高潮。

中国同盟会较英美等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要年轻220多岁，却独具不容漠视的战斗力和功绩：它甫一诞生，坚决抵制和揭露清朝廷的立宪骗局，使同盟会的政治思想和革命纲领得到广泛传播；同时，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在各地发动多次武装起义，猛烈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打击了清王朝统治，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而其最为辉煌的一页则是在 1911 年 10 月 10 日，在同盟会的推动下，革命党人举行了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同年 12 月 29 日，已经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 17 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推翻了清王朝 268 年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作为中国政党发轫的中国同盟会，在其并不长的历史中，建立奇功，其历史功绩彪炳青史：

第一，它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埋葬了在中国延续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大大超过了以往历次农民战争的意义，也超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境界，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短暂的“黄金时代”，解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掀起了兴办实业的热潮，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辛亥革命彻底打碎了漫长封建社会中皇帝“至高无上”的神圣光环，实实在在地将皇帝“拉下了马”。从此，“天赋人权，胥庶平等”，自由博爱，昭若日月，深入人心，使民主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它使中国从此再也不可能走封建帝制的老路，奠定了中国作为政党国家的基本格局。

（二）民国初年多党制的尝试。

政党是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的一个创造。如同资产阶级把生产的社会化带入人类的经济生活一样，它在上升时期，也把近代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带进了人类的政治生活。民国初年多

党制的尝试，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追随世界潮流的努力。

首先，中华民族历史上遭受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什么“文字狱”、“党禁”不一而足，人们渴盼早日解脱。辛亥革命实现了人民的夙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二条开宗明义地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从而在我国根本大法上第一次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约法》还具体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首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人民结社自由的权利，为政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于是，政党政治迅即成为一种时尚和一种政治体制的装饰品。

其次，世界政党的发展，对中国政党群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20世纪初，世界政党制度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已日臻完善。它的模式可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其中，多党制在世界上比较普遍。各个政党可以根据各国宪法精神，单独或联合其他政党进行竞选，由获胜政党组成政府，或以该党为主联合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政党角逐于议会选举，是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活跃力量。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青睐。

再次，权力的诱惑是政党蓬勃兴起的一大动力。各党试图通过竞选而掌握国家政权，施展宏图大略。

正是基于上述多种因素，民国初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名大姓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①一时间，各种政党、社团纷纷成立。据有人记载，当时中国政党多达300

^① 冰心著：《北京社会之面面观》，1913年1月3日《时事新报》。

余个，号称政党林立时代。

从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13年4月第一次国会召开，围绕着权力分配，逐渐形成了三个派系、四大政党的格局，即：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地主买办阶级派三派，同盟会及其改建的国民党、立宪派组织的民主党、地主买办阶级组织的共和党和统一党四大政党。除这四大政党外，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党派，如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宪政会、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自由党、民宪党等等。另有众多的政党团体，或有组织而无政纲，或有政纲而无活动，或只宣布成立而无固定组织机构，其中有很多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政治影响就烟消云散了。剩下的一些，为时不久，或自行解体，或被迫解散。

以上四大政党则围绕着拥护孙中山还是拥护袁世凯分为两大营垒，为竞选国会席位展开了激烈斗争。在当时具有议会性质的临时参议院里，130个议席中，同盟会占了40多个席位，其次是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等政党。内阁也由多党组成，在唐绍仪内阁中，同盟会成员主管了司法、农村、工商、教育4个部，共和党、统一党成员及无党派人士也出任了内阁中其他一些职务。而且，多党组成的内阁和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有过一定的约束作用。如参议院曾投票否决袁世凯提出的陆征祥内阁。

当然，这一切绝非袁世凯所愿，更不因此表证袁世凯已服膺这种政党政治。辛亥革命胜利后，长期统摄中国封建政治舞台、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影响至深的地主买办阶级显然不会甘心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作着垂死挣扎，而北洋军阀集团首领袁世凯就成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新政治代表。然而同盟会本身却存在不同的政治分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君主立宪派及反满派等不同派别的松懈联盟。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组织内部即产生了激烈分化，这不但使其梦寐以求建立共和的理想没

有实现,反而很快被封建军阀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3个月,孙中山在各方压力下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由于民主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并且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还掌握着一部分政治、军事力量,在南方几省还占统治地位,袁世凯篡夺领导权后,一时尚无力控制全国局势,因此,还不敢公开背叛共和,实行独裁统治,只能打着“共和”的旗号,逐渐积蓄自己的势力,并一步步破坏资产阶级共和制度。

但是,革命党人没有认清袁伪装效忠共和的实质,并未意识到多党制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短暂命运。他们天真地相信西方资产阶级多党制能给中国带来光明,仍幻想在袁统治之下推进共和,实行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特别是1912年冬进行的全国首次正式国会选举中,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大显身手,旗开得胜,获参众两院议席392个,比共和、民主、统一三党的总和还多168席,居绝对优势。^①宋教仁因此兴奋不已,踌躇满志,认为由国民党组阁指日可待。但是,大选的胜利,并未给资产阶级带来任何好处,等待宋教仁的并不是内阁总理,而是刺客的子弹。1913年3月,年仅32岁的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不久国民党又被宣布为“乱党”而被勒令解散,国民党议员被逐出参议院,甚至扶持袁上台的保皇党、进步党后来也未能幸免被一脚踢开的厄运。而与这些行径相配合的,则是袁世凯由大总统到终身总统,进而于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登基,当上了“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革命党(1913年9月在东京由国民党改

^① 参见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组而成)发动一系列讨袁护国运动。北洋军阀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和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帝制,并于1916年6月在惊恐中死去。

然而,袁世凯的窃国称帝,也宣告了资产阶级多党制在中国的彻底破产。多党林立和政治纷争仅是民国初年出现的特有现象。多党制的昙花一现,表明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议会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究其主因:

首先,最根本的在于缺乏实行多党政治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政党是特定阶级的集中代表,即特定的阶级成员是其得以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很不发达,资产阶级阵容本身就不强大,且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又分化为充当帝国主义侵略走狗的大资产阶级和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更加之民国初年资产阶级中多数人还抱着“在商言商”的宗旨,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对于国家事务与自身利益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至多希望得到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环境。依凭这一量少质“次”的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到成功,并确立政党政治,显然勉为其难,他们压根儿就缺乏实行多党制的能力。

其次,民初缺乏实行多党制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实行政党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国民具有一定的党派意识,并积极参与政党活动,也即政党政治的正常运作,有赖于国民素养和参政热情的提高。而严重地脱离群众正是民初各党的通病,即便当时最具革命性的国民党也不例外。它们不是把竞选的着眼点放在民众,尤其是选民方面,而是肆无忌惮地操纵选举,愚弄民众。当时几乎所有政党都不与民众发生关系,使其形同水上浮萍。而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坚定的先进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与巩固仅是纸上谈兵。

再次，民初极端敌对的党派意识，违背了政治运作的常规。因为假如没有全国政党平等竞争的政治环境，迟早会祸殃资产阶级各个政党。如此，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健康地存在与发展。孙中山曾主张在政党政治中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然而，民初的中国政党则尔虞我诈，多以种种手段排斥异己，防止他党内部的发达，阻碍他党外部的扩大，不自觉地充当了政党政治的绊脚石。

最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当政，极力扼杀多党制。民初，权大于法。国会对内阁的批准权完全失控。军队、财源等国家命脉尽握于袁世凯一人之手。民国只有名义，总统才是真正的军事统治者。袁世凯任意玩弄各政党，北洋军警的铁蹄恣意践踏责任内阁制。国会难以行使立法权、财政和内阁批准权、行政监督权。国会犹如一只孱弱的山羊遇到穷凶极恶的狼群一样，不可能安然无恙、和睦共处。如不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失败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及其试图建立的多党制，而绝对不可能是其对立面。

（三）国民党一党制的兴衰。

较之资产阶级多党制的昙花一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一党制应该说有过充分的表演。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手创建的国民党，在民主方面曾有过可圈可点的实践，尤其是它和中国共产党一起进行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发动了北伐战争。其间，国共两党团结协作，一举推翻了北洋军阀，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然而，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新三民主义纲领，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镇压了同自己并肩战斗的伙伴共产党后，又同各地方军阀达成妥协，在中国建立起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法西斯政权。

1928年8月8日至15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实施“训政”，极力鼓吹“以党治国”方针。在同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通过的《训政纲领》中，确立了“以党治国”、五权分立的政权模式。其实质，则是在“以党治国”的幌子下，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居于亿万民众之上。其建立的五院制，背离了孙中山五权宪法、权能分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成为独裁专制的遮羞布。

应当看到，自辛亥革命以来，经由孙中山领导的几次护法斗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五四运动的爆发，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正是倡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反封建、要民主已成为当时先进中国人的共识。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谁欲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取信于民，都不能不以民主的名义。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多年，当然深谙此道。虽然内心极为推崇封建独裁这一套，但他在表面上却将自己打扮成孙中山最忠诚的学生，同时，又不忘为自己封建独裁的政权尽可能贴上从孙中山民主思想中剽取来的民主新标签，遂有了前述的“训政纲领”。

训政最早是由孙中山提出来的。1914年，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首次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所谓军政时期，又称破坏时期，扫除国内障碍，促进国家统一；训政时期，又称过渡时期，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又称建设完成时期，根据“权能区分”原则，进行民主宪政建设。训政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其基本任务是推行地方自治。蒋介石则假借这些词汇，在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为剪除异己，确立蒋系的统治地位，穷兵黩武。蒋称此为军政时期。而当派系斗争基本结束之时，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正式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1936年5月5日，南京政

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提出“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的口号，训政一直延长到1948年3月国民党“行宪国大”召开，前后长达20年。那么，国民党在“训政”的幌子下，又干了些什么名堂呢？

首先，是实行精神控制。蒋介石把“四维八德”看作是“做人、教人、革命与复兴民族”的起点。1934年，蒋发起新生活运动，认为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四维八德”是中国立国之纲。1943年，蒋介石又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竭力美化封建宗法制度及其哲学伦理思想。他宣扬的愚忠，再加上“力行哲学”，意在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

其次，是实行思想钳制。出于封建专制独裁的需要，蒋介石公开贩卖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就提出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他说：“以党治国，就是以中国国民党治国，就是以三民主义治国”；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国民党就一定要失败”；“共产党就是本党的敌人”。^① 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也公开鼓吹，要“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他们表示，对蒋介石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②

再次，是实行组织管制。为加强国民党独裁统治，蒋介石发展了“中统”与“军统”两大特务系统以及保甲制度。1938年8月，正式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它是蒋介石党务系统的最高特务组织，是“机关公开，业务秘密”的特

^① 参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2—563页。

^② 参见陈旭麓主编：《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384页。

务机关，负责党派、民意和贪污三项调查任务，以党政机关、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军统”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蒋介石军务系统的最高特务组织，也是1938年8月成立。它主要渗入军队、警察、外交、交通等部门。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加强统治农村的一项措施。全国的保甲，定为基层自治组织。它融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与思想统治于一体，融行政管理与军事管理于一体，使保甲制度“党化”、“警察化”和“特务化”，从而实现所谓“管、教、养、卫”的目的。

正是上述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相互渗透，构成了蒋介石在“训政”幌子下的封建法西斯专制制度。这一套其表里相去判若云泥的做法，不仅遭到共产党的坚决反对，也遭到国民党内部左派进步人士乃至一些右派人士不同程度的抵制。而事实上，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2年间，也确曾几次出现过施行民主的大好机会，其中最好的良机出现在抗战爆发及抗战胜利后。

鉴于华北事变，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37年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示蒋介石同意共产党共赴国难的行动。它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也预示着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而伟大的前途，即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对抗战比较努力，同中共关系也较好。此后其总政策则蜕化为妥协、分裂、倒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共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但毕竟蒋介石最终留在了抗日阵营中，仅就这一点而言，国民党对抗战仍有一定功劳。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甚高。《双十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都确立了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的原则。一时在中国大地上充满着民主的氛围。人们对蒋介石这次能够实行民主